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 主编 陈文新

游戏八股文研究

王颖 黄强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 主编 陈文新

游戏八股文研究

王颖 黄强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戏八股文研究/王颖,黄强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12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陈文新主编
ISBN 978-7-307-16964-7

I. 游… II. ①王… ②黄… III. 八股文—研究—中国 IV. H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0710 号

责任编辑:李 程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9.25 字数: 421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6964-7 定价: 9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傅璇琮

主 编 陈文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海峰 刘爱松 陈文新 陈水云

张思齐 罗积勇 周 群 赵伯陶

陶佳珞 黄 强 詹杭伦 霍有明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总序

陈文新

(一)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 1300 年的历史。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 19 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①

科举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它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官员选拔的理想境界是“实质的公正”，即将所有优秀的人才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但这个境界人类至今未达到过。不得已而求其次，“程序的公正”就成为优先选择。“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宗法制，家长统治、任人唯亲、帮派活动、裙带关系皆为家族宗法制的派生物，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若没有可以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汉代的察举推荐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走向求才的死胡同便是明证。”“古往今来科举考试一再起死回生的历史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悠久的科举历史与普遍的考试现实一再雄辩地证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②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制度不但在诞生之初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文帝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① 胡适：《考试与教育三百》，《胡适文集》第 12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8 页。

^②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3、136 页。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维护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其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虽然一再愤愤不平地说到中国文化的种种不是，但在《考试与教育》一文中，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古代那种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形下，中央可以不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公开和公平。胡适所说的公平，包括三种含义：一是公开考选，标准客观。二是顾及各地的文化水准，录取的人员，并不偏于一方或一省，而是遍及全国。三是实行回避制度，“就是本省的人不能任本省的官吏，而必须派往其他省份服务。有时候江南的人，派到西北去，有时候西北的人派到东南来。这种公道的办法，大家没有理由可以反对抵制。所以政府不用靠兵力和其他工具来统治地方，这是考试制度影响的结果”^①。这些话出于胡适之口，足以说明，即使是文化激进主义者，只要具有清明的理性，也不难看出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今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2005年，任继愈曾在《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一文中提出设立“国家博士”学位的设想。其立论前提是：我国目前由各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缺少权威性和公正性。之所以不够权威和公正，不外下述几个原因。其一，“各校有自己的土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取得学位后，它的头衔在社会上流通价值都是同等的”，这当然不公平。其二，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外语上，第二年大部分时间忙于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发论文，第三年忙于找工作，这样的情形，怎么可能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博士？其三，几乎所有名牌大学都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派秘书代他上课，甚至不上课而拿文凭，这样的博士能说是名副其实的吗？只有设立“国家博士”学位，采用统一标准选拔人才，这样的“博士学位”才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而国家在高级人才的选拔方面统一把关，不仅可以避免“跑”博士点和博士生扩招带来的许多弊病，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而且，由于只管考而不必太多地管教，还可以节省大量开支。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确是值得参考借鉴的。任继愈的这篇文章现已收入《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有心的读者不妨一阅。

与任继愈的呼吁相得益彰，早在1951年，钱穆就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针对民国年间（1911—1949）人事管理腐败混乱的状况，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②。钱穆的意思是明确的：参考借鉴科举制度，有助于人事管理的规范化和公正性。1955年，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无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

② 钱穆：《国史新论》，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14~115页。

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① 现代中国的人事管理理应借鉴源远流长的科举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如何借鉴，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以其“程序的公正”为国家选拔了大量行政官员，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维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方面，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作用，这是其显而易见的功能；它还有其他不那么显著却同样值得重视的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和人文教育功能：科举制度以其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将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们试就此略作讨论。

明清时代有一项重要规定：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这一规定是耐人寻味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心、培育道德感的主要读物。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秦汉以降，“中国的脊梁”大多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曾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就是蕴蓄着崇高的道德感的心灵。他还有一首《正气歌》，开头一段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为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身在治世，正气表现为安邦定国的情志；身在乱世，则表现为忠贞坚毅的气节。即文天祥所说：“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

文天祥是宝祐四年（1256）状元。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它表明：进士阶层在实践儒家的人格理想方面，其自觉性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宋代如此，明代如此，甚至连元代也是如此。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论及“元末殉难者多进士”这一现象：“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接下来，赵翼列举了余阙、泰不华、李齐、李黼、王士元、赵璘、周鏊、聂炳元、刘耕孙、丑闾、彭庭坚、普颜不花、月鲁不花、迈里古思等死难进

^①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士，最后归结说：“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① 在元末殉难的进士中，余阙（1303—1358）是最早战死的封疆大臣。他的朋友蒋良，一次和他谈起国难，余阙推心置腹地说：“余荷国恩，以进士及第，历省居馆阁，每愧无报。今国家多难，授予兵戎重寄，岂余所堪。然古人有言：‘为子死孝，为臣死忠。’万一不幸，吾知尽吾忠而已。”余阙殉难后，蒋良作《余忠宣公死节记》，开篇即强调说：“有元设科取士，中外文武著功社稷之臣历历可纪。至正辛卯，兵起淮、颍，城邑尽废，江、汉之间能捍御大郡、全尽名节者，守豫帅余公廷心一人而已。”^② 在余阙“擢高科”的履历与他忠勇殉节的人格境界之间，人们确认有其内在联系。无独有偶，《元史·泰不华传》在记叙元末另一著名的死节之臣泰不华（1305—1352）时，也着重指出：其人生信念的基本依据是他作为“书生”所受的儒家经典教育。在与方国珍决战前夕，泰不华曾对部从说过一番词气慷慨的话：“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守海隅，贼甫招徕，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书生”“所学”与捐躯“报国”之间关系如此密切，足见以《四书》《五经》作为基本考试教材的科举制度，它在维持世道人心方面的作用的确是巨大而深远的。

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功能不仅泽及宋元，泽及明清，甚至泽及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的现代。其实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原因在于，不少现代名流的少年时光是在科举时代度过的，他们系统地受过这种教育，耳濡目染，其人生观在早年即已确立并足以支配一生。儒家经典的生命力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余泽亦由此可见。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并有意多引他的言论。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世人眼中的胡适，只是一个文化激进主义者，以高倡“打倒孔家店”著称。人们很少注意到，胡适在表面上高呼“打倒孔家店”，但在内心里仍对孔子和儒家保留了足够的敬意，是儒家人生哲学的虔诚信奉者和实行者。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章有胡适的如下自白：“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理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在这场伟大的‘新儒学’（理学）的运动里，对那（道德、知识；也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两股思潮，最好的表达，便是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后世学者都认为‘理学’的真谛，此一语足以道破。”同一章还有唐德刚的一段插话：“‘要提高你的道德标准，你一定要在“敬”字上下功夫；要学识上有长进，你一定要扩展你的知识到最大极限。’适之先生对这两句话最为服膺，他老人家不断向我传教的也是这两句。一次我替他照相，要他在录音机边作说话状，他说的便是这两句。所以胡适之先生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他反对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都是从

①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6页。

② 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8页。

‘理学’这条道理上出发的。他开口闭口什么实验主义的，在笔者看来，都是些表面账。吾人如用胡先生自己的学术分期来说，则胡适之便是他自己所说的‘现代期’的最后一人。”^① 胡适是在少年时代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在经历了废止科举、“打倒孔家店”等种种变故后，儒家的人生哲学仍能贯彻其生命的始终，由此不难想见，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科举时代，儒家经典对社会精神风貌的塑造可以发挥多么强大的功能。虽然生活中确有教育目标与实际状况两歧的情形，但正面的成效仍是不容忽视的。

“精神文明”是中国人常用的一个概念。“精神文明”是相对物质文明而言的，就个人而言，需要长期的修养，就民族而言，需要长期的培育。中国古人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所以常常强调“潜移默化”，经由耳濡目染的长期熏陶，价值内化，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如果这种道德规范大体近于人情，既“止乎礼义”而又“发乎性情”，它对社会的稳定，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化的功能。目前教育界所说的“深厚的人文知识素养，有助于塑造高尚的精神世界，提高健康的审美能力”，与这个意思是相通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时代的基本读物，人文教育功能是其不容抹杀的价值，并因制度的保障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被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② 罗兹曼的意见也许是对的。而我想要补充的问题是：在科举制废止之后，如何保证《四书》《五经》的人文教育功能继续得到发挥？

(三)

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科举制度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这是我们编纂出版《中国科举文化通志》的初衷，也是我们不辞劳苦从事这一学术工作的动力。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重点包括下述内容：

1. 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433页。

^② [美] 吉尔伯特·罗曼兹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635页。

从《新唐书》开始，历代正史多有《选举志》。历代《会要》、《实录》、《纪事本末》等史传、政书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科举制度沿革的资料。还有黄佐《翰林记》、陆深《科场条贯》、张朝瑞《明贡举考》、冯梦祯《历代贡举志》、董其昌《学科考略》、陶福履《常谈》等一批专书。历代《登科录》和杂录类书籍，也保存了大量关于科举的材料。唐代登科记多已散失亡佚，有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可供参考。宋元登科记保存稍多，明清有关文献尤为繁富。

2. 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

八股文是最引人注目的考试文体。八股文集有选本、稿本之分。重要的选本，明代有艾南英编《明文定》、《明文待》，杨廷枢编《同文录》，马世奇编《澹宁居文集》，黎淳编《国朝试录》等；清朝有纪昀《房行书精华》，王步青编《八法集》；还有《百二十名家集》，选文3000篇，以明代为主；《钦定四书文》，明文4集，选文480余篇，清文1集，选文290余篇。稿本为个人文集。明清著名的八股大家，如明代的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清代的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方苞、王步青、袁枚、翁方纲等人，均有稿本传世。相关著述数量也不少。清梁章钜《制义丛话》等，是研究八股文的重要论著。其他考试文体，如试策、试律等，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这些科举文献，一般读者不易见到，或只能零零星星地见到一些，或虽然见到了也难以读懂，亟待系统地整理出版，以供研究和阅读。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包括以下数种：《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律试策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礼部韵略〉与宋代科举》、《元明科举与文学考论》、《游戏八股文研究》、《明代八股文选家考论》、《唐代科举与试赋》、《〈儒林外史〉的现代误读》、《科举废止前后的晚清社会与文学》等。我们这套《中国科举文化通志》，以涵盖面广和分量厚重为显著特征，可以从多方面满足阅读和研究之需。而在整理、研究方面投入的心力之多，更是有目共睹。我们的目的是为推进学术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是一项规模宏大、任务艰巨、意义深远的大型出版文化工程。编纂任务主要由武汉大学专家承担，并根据需要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扬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或科研院所聘请了若干学者。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邓绍基先生等在学术上给我们提供了若干指导；参与这一工程的各位专家不辞辛苦，努力工作，保证了编纂进度和质量；武汉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中国科举文化通志》的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2015年4月13日

于武汉大学

目 录

导言 游戏八股文的文学性和游戏因素	1
一、游戏八股文的由来	1
二、游戏八股文的数量和种类	3
三、游戏八股文内容的游戏性质与不同价值	7
四、游戏八股文的欣赏趣味及意义	10
第一章 八股韵味的荒诞剧：《东郭记》	15
一、“以时文为南曲”的时代风尚	16
二、讽刺古圣贤的历史剧	25
三、《东郭记》的八股式文题	34
四、《东郭记》的八股结构	48
五、“代人立言”的多重叙述方式	55
第二章 八股化的话本小说：《七十二朝人物演义》	66
一、尊经与风教：《人物演义》的八股内涵与阐释角度	66
二、《人物演义》的八股结构特征	76
三、袁黄生平与《七十二朝人物演义》	87
四、儒学世俗化：《人物演义》产生的背景	94
五、通俗文学性与劝善宗旨的结合	106
第三章 《西厢》制艺及版本研究	116
一、才子文风：《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118
二、《雅趣藏书》与《才子西厢醉心篇》	137
三、《西厢》制艺的版本种类	152
四、时文手眼：金批《西厢记》与《西厢》制艺的结合	167
五、《西厢》制艺的评点方式及其衰亡	189

第四章 游戏八股文的雅俗之变	204
一、集句八股的兴盛及文学特征	205
二、游戏八股的民间俚俗化倾向	216
三、晚清报章游戏八股的盛衰及价值	235
四、游戏八股文的余波：分咏体诗钟	248
附录：《游戏八股文集成》补遗	260
独乐文(苕霅散人)	260
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潘书馨)	262
今若此无羞恶之心(兰皋主人)	264
妻妾相争文(李伯元)	265
滑头文(李伯元)	266
咬文(吴永书)	267
诵《诗》三百	268
做官	269
俗吏篇(张苇芝)	270
东倒吃猪头西倒吃羊头(缪艮)	271
陆陆(伴花居士)	273
惧内(潘搢兰)	275
打野鸡(《笑林报》)	276
戒食鸦片烟文(《消闲报》)	277
某相国绝命文(某报)	278
嫖赌不如吃着(《笑林报》)	279
小脚文(旷望生)	280
墨匣(来鸿璫)	281
老而无妻(寅半生)	282
吸洋烟集四书文(卓如)	284
永诀文	285
开口告人莫难(《笑林报》)	286
只将花笑拈(伪托唐寅)	287
一灯孤影摇书幌(伪托李贽)	288
乍相逢不记得真模样(伪托陶望龄)	289
见他时要看十分饱(伪托尤侗)	290
贪看莺莺烛灭香销(伪托唐寅)	291
念到有一千番张殿试(伪托吕留良)	292
只道尔文学海洋深 谁道尔色胆天来大(无名氏)	293

下香阶懒步苍苔(伪托王鏊 文恪)	294
他说小姐权时落后(伪托李贽)	295
将牙儿衬着衫儿袖(伪托赵鸣阳)	296
后记.....	297

导言 游戏八股文的文学性和游戏因素

八股文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极为重要的科举文体，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所产生的影响可谓深远巨大，周作人在新文学时期谈到中国文学的旧传统时认为：“应该大讲其八股，因为八股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的起源。”^①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八股文始创于明代^②，“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③。其题目取自“四书”“五经”之中的章句，摹拟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文体兼及诗赋与策论，排偶成股，是一种兼容古代几种重要文学样式的特殊文体，开创了古代文体样式的新类型。

一、游戏八股文的由来

八股文亦称制义、经义，或曰制艺、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帖括，又有程文、墨卷、房稿等称^④。科举八股文的考题主要取自《论语》、《大学》、《中庸》、《孟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6页。

② 论及八股文的产生，学者大体认定八股文与宋代经义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刘熙载《艺概·经义概》称：“经义试士，自宋神宗始行之。神宗用王安石及中书门下之言定科举法……今之四书文，学者或并称经义。”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称：“夫自唐取士有明经一科，而宋兴因之，不过试以墨书贴义徒取记诵而已。神宗时，王安石撰《周礼》、《诗》、《书》三经义颁行试士，旧法始变。彼其欲以己说一天下，事固无是理，然其所制义式，至今仿之，盖不得以人废法也。”明代应试八股文体式的发展有一个逐渐完备的过程，《大明会典》中《礼部·贡举》：“（洪武）二十四年定文字格式……凡作四书经义，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

③ 《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93页。

④ 称制义者因科举考试依皇帝诏命而行曰“制”，所试内容为经书义理曰“义”，故此也称经义；制艺则是强调八股文的文艺和文学特征；时艺和时文侧重于强调当下流行的科举考试文体；八比文则为八股文的俗称，强调其文两两相对的特征；四书文是其文题目取之于四书；帖括源自唐代科举考试之帖经，是科举文体的代称；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谓之程文或墨卷；十八房进士所作之文称为房稿。

子》的“四书”，要求“代圣贤立言”，所以称“四书文”；因其文体形式主要脱胎于宋元科举文体——经义，所以又沿用了经义的名称；因为皇帝诏命称“制”，士子奉命而参加考试，考试内容表达经书的义理，所以八股文又称为制义；同时，八股文也是一种文艺或技艺，所以也称之为制艺；又因为参加科举考试作八股文要揣摩迎合时下文风，所以又称为时文。而游戏八股文则可视作“仿经义体”、“仿时文体”、“仿制义体”等，因其具有明显的文学性特征，故而亦常称为“游戏制艺”。

八股文本身包含着丰富的文学因素，这些文学因素成为游戏八股文诞生的重要条件：

第一，代言体的文学虚构因素。八股文是典型的“代言体”，使用不同的口吻设身处地化身代言对象，各肖其音容笑貌，因此，代言过程中必定产生虚构因素。正宗八股文“代圣贤立言”，代言目标集中在少数圣贤身上，虚构性受到很大限制。有好事文人转而寻求其他代言对象，于是，“四书”“五经”中的三教九流皆可代言。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为文学作品中人物代言，为现实生活中人物代言，就成为“游戏八股文”。

第二，题型多样化的文学因素。八股文的题目有大题、小题、截搭题等，当八股文脱离“代圣贤立言”的束缚之后，就出现了叙事小题、游戏小题、比兴小题、俚俗小题、咏物小题等类型，这些题目类型都具有文学因素，如孙仁儒《东郭记》，每出标目采用《孟子》原句，多运用八股小题作游戏文字；如《少艾》等，将圣人之言与文学讽刺手法相结合。又如分咏体诗钟，运用八股文截搭题手法，将两个互不相干而又反差极大的事物对举为题，要求作者用一联将两者配搭起来，并要搭得天然巧妙，言近旨远。

第三，“骈偶结构”的文学因素。八股文作为“律文”，特重谋篇布局：一题树标，八股归统，起承转合，勾连成文，要求作者从整体结构上把握文章，注意内部的逻辑联系；而排比连缀，分股对偶，又饶有参差错落的声韵之美。清代李渔说：“分股则帖括时文是已，先破后承，始开终结，内分八股，股股相对，绳墨不为不严矣。”^①当游戏八股文将骈偶结构发挥到极致，便会产生分股对仗，骈俪排偶，尽显声韵格律的动人美感，如锦心绣口的《西厢》制艺文。

第四，文章技法的文学因素。八股文讲究“为文之法”，有其技巧趣味。章学诚《文史通义》云：“脱增减兮毫厘，即步移兮影徙……或语全而意半，或神到而形未。如云去而尚留，如马跃而未逝。纵收俄顷之间，刻画几希之际。水平剂量，何足喻其充周；历算交躔，曾莫名其微至”；^②包世臣称八股文“凝思至细，行文至密。所有近辉远映、上压下垫、反敲侧击、仰承俯引之法，反较古文为备”^③。要作好八股文，就必须处理好若干对应关系，如断与连、吞与吐、揖与让、虚与实、正与反、直与曲、急与缓、起与伏、开与合等。而游戏八股文的技巧趣味正寓于对这类关系的微妙的处理之中。

^① 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音律第三”，《李渔全集》，第3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② 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二《内篇二·言公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8页。

^③ 包世臣：《论文·或问》，《艺舟双楫》卷二，《丛书集成续编》，第8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八股文是中国古代文体中综合性最强的一种，它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兼容了多种文体要素，又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鲜明特征。当八股文用于科举考试时，实用性相对掩盖了文学性，而游戏八股文则极大地拓展了文学功能，张扬了八股文的文学性。游戏八股文通过融入八股文的一种或多种文章要素，写成或幽默、或诙谐、或庄重、或嘲讽的文学作品。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游戏八股文不必都是正宗八股文的结构形式，事实上，即使正宗八股文也是形式多样的，不一定都分股对偶。从现存的被称之为“制艺”的游戏八股文看，许多作品在文章形式上相当随意，根本不是八股对仗的结构形式。我们甚至也可以从文章的用途来看，如缪艮认为：“今之所谓文章者，凡以博功名也。文章不博功名，直谓之游戏焉”^①。也就是说，凡是不用于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都可以视作“游戏八股文”。因此，“游戏八股文”的范围宜宽而不宜窄。我们称其为“游戏”的八股文，既指内容方面的游戏，同时指形式方面的游戏。那些渗透了诗歌、辞赋、小说、戏曲、诗钟等形式的游戏文章，直接视其为游戏八股文亦未尝不可。作为游戏八股文的诗歌、小说、戏曲是形式较为特殊的文体。在八股文出现以前，没有这一类的诗歌、小说、戏曲。这些作品中蕴涵了一种或多种八股文的文章要素，因此它们拥有了八股文的特殊趣味，不同于一般诗歌、小说、戏曲形式。故而，着意运用八股文体裁写成的“《西厢》制艺”是游戏八股文，随意阐述“四书”章句微言大义的传奇《东郭记》、小说《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七律《论语诗》、集句文赋以及分咏体诗钟也是游戏八股文。

二、游戏八股文的数量和种类

从目前所发现的文献记载可知，明清文人染指游戏八股文乃一时风气，现罗列数则如下，以见一斑：

1.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云：“万历后作小题文字，有谐谑失度，浮艳不雅者，然未至如（周）延儒，以一代典制文字引申圣言者，而作‘岂不尔思’、‘逾东家墙’等淫秽之词，其无所忌惮如此。”^②由此看来，明代万历以后已有文人搜取“四书”中风流话头作游戏八股文，连周延儒这样的科举状元也在所不免。

2. 孙仁孺《东郭记》传奇刻本卷首附列萧伯玉题为《齐人》的游戏八股文一篇，嬉笑怒骂，滑稽之至。作者满腔愤世嫉俗之郁闷俱倾泻笔下。小序云：“尝读萧伯玉《齐人篇》戏作十首，各一仪局，俱堪诸笑。聊刻其一，以为此传别录，即以作跋可也。游戏之仙，滑稽之圣，当不令汤若士独有临川。”^③仅“齐人”一题，萧氏的游戏八股文竟多达十篇。

^① 缪艮：《文章游戏》三编，嘉庆戊寅秋经纶堂藏板。

^② 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页。

^③ 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2册，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334页。（引用时句读有所改动）该书收入此段文字时，首句标点为“尝读萧伯玉《齐人篇》，戏作十首”，认为“戏作十首”的是孙仁孺，细玩文义，非也。

3. 王思任《唐诗记事序》云：“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①何以王思任将明代“必传之言”归之于“明之小题”？因为场下的小题文才有各妍其态的“游戏”可能，而这些充满游戏感的小题文被视为有明“一代之言”，可见王思任之推重，而当时的小题游戏文亦不在少数。

4. 焦循《易余籥录》卷十六云：“八股有小题，或枯窘，或游戏，如诗之咏物，宜出以古雅，令人解颐。明末王遂东最工于此。”^②王遂东即王思任，为人诙谐幽默，作八股文好为游戏小题，故而他也对“明之小题”推崇有加。

5. 倪鸿宝《孟子若桃花剧序》云：“文章之道，自经史以至诗歌，共禀一胎，要是同母异乳，虽小似而大殊。惟元之词剧，与今之时文，如孪生子，眉目鼻耳，色色相肖。盖其法皆以我慧发他灵、以人言代鬼语则同。而八股场开，寸毫傀儡，宫音串孔，商律谱孟，时而齐乞邻偷，花唇取诨；时而盖骀鲁虎，涂面作嗔；净丑旦生，宣科打介则同。”^③“宫音串孔，商律谱孟”还是正宗的八股文，“时而齐乞邻偷，花唇取诨；时而盖骀鲁虎，涂面作嗔”便是地地道道的游戏文字了。

6. 褚人获《坚瓠十集》卷三“遗臭文词”条云：“顺治甲午春，郡中陇西翁与太原君有虞芮之讼……滑稽者乃序其事，而次之以《开场始末》一折、《四书文义》五篇……颜曰《遗臭文词》。”现实中的狱讼都可以成为游戏八股文的素材。

7. 张潮在他的《尺牍偶存》中有《复柴陞升》一札。书云：“两奉琅函，兼拜佳制，低回往复，如获百朋。不谓《牡丹亭》忽现八股身而说法。虽欲不推为绝调不可得也。”^④所谓“佳制”、“绝调”均指柴陞升为《牡丹亭》人物立言的游戏八股文。

8. 尤侗曾说：“唐人以诗取士，亦用四子题，如‘行不由径’、‘知者乐水’之类，后人罕有拟者。今春入长安，见新郎君东涂西抹，方以制艺，争霸为此。寂寂白日，笑人作诗则违众，作文则近于效颦，因仿唐人法于诸公，三试，日各赋十题，酒酣耳热，叉手便成。观者当悯其无聊，勿以嬉笑怒骂律之。若比于张子韶《论语颂》，则吾岂敢？”^⑤“新郎君东涂西抹，方以制艺”的便是“八股诗”。

9. 清代张潮也曾作“八股诗”若干首，原书未见，由张氏所辑《友声》、《尺牍偶存》中所收几通书信可知其大概。《尺牍偶存》蔡方炳序云：“才人之奇，何所不可？然不能创今人所未有，则奇亦不至。今人读圣贤书，束缚于八股之业，奇才无以自骋，间肆力

① 王思任：《唐诗记事序》，《王季重十种·杂序》，《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版，第79页。

② 焦循：《易余籥录》卷十六，光绪戊子夏德化李氏刊木犀轩丛书本。

③ 郑元勋辑：《媚幽阁文娱》，《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2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④ 张潮刊：《尺牍偶存》卷首，北京图书馆藏康熙刊本。

⑤ 尤侗：《西堂全集·论语诗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1页。